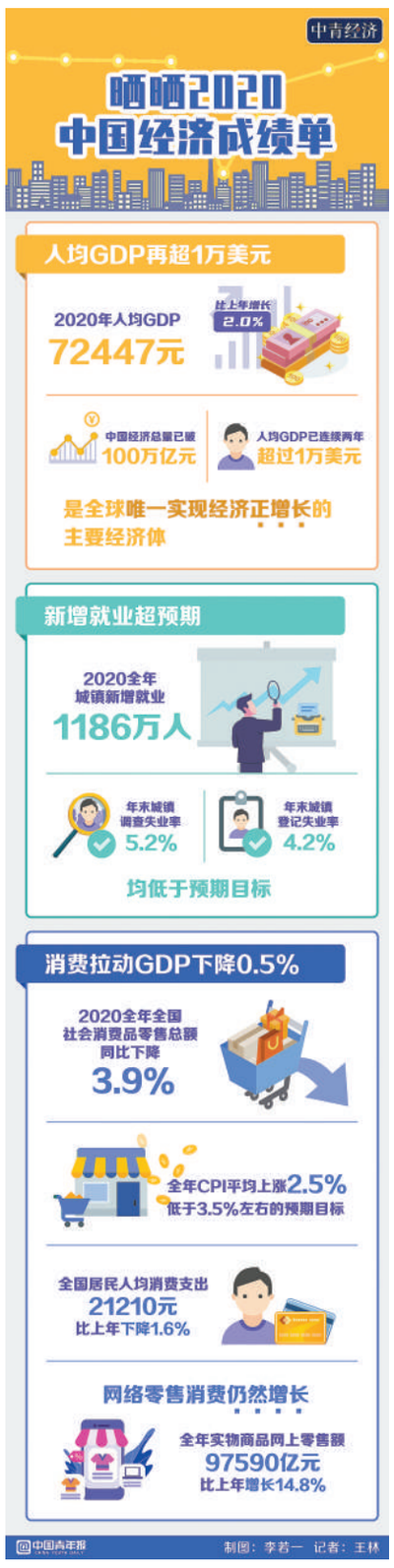

青年经济说

中国经济走出V型曲线，有哪些硬核支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林

人均GDP是经济产出效率的刻画指标，用以说明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衡量经济发展长期变动。英国用了150多年，将人均GDP从1300美元增长至2600美元，美国实现同样的倍增，用了53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0年，就实现了10倍增长，人均GDP从1000美元上升到1万美元以上。

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这份中国经济的“综合评价表”显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0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447元，比上年增长2%。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介绍说，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中国也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7%。

2019年一到四季度，中国GDP分别同比增长6.3%、6.0%、5.9%、5.8%，2020年一到四季度分别同比增长-6.8%、3.2%、4.9%、6.5%。盛来运说，中国经济“走出了一条令世界惊叹的V型曲线，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

人均GDP连续2年超1万美元

虽然已从政府部门退休多年，但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还是很忙。每次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发布，他的电话都可能被打爆。外界想知道，这位国家统计局前总经济师如何评价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

对于2020年的中国经济，姚景源尤其看重两个指标：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在他看来，前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块头”，“有了块头，抗风险能力才够强，韧性和回旋余地才会大”，后者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和未来增长潜力的标志”。

2010年，中国GDP总量为401513亿元；10年后GDP总量达101.6万亿元，圆满实现翻一番的目标。“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如今我们在总量上已经完成了任务。”姚景源说。

盛来运表示，过去一年，我国加大精准脱贫力度，持续推进污染防治，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下最难的堡垒，啃下最硬的骨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

相比GDP总量，国际上更为关注的是人均GDP指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其代表作《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人均GDP是经济产出效率的刻画指标，用以说明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衡量经济发展长期变动。

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国家人均GDP的增长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英国用了150多年，才将人均GDP从1300美元增长至2600美元，美国实现同样的倍增，也用了53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0年，就实现人均GDP从1000美元升到1万美元以上的10倍增长。

但是，人均GDP1万美元也经常被视为一个门槛。世界银行用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划分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人均GNI12375美元以上的国家视为高收入国家。对中国而言，人均GNI与人均GDP差距很小，目前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

追踪各国历史，大多数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陷入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鲜有跻身高收入国家者。因此，世界银行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曾提醒，改革开放使中国跨越“贫困陷阱”，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但要注意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姚景源认为，人均GDP已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依然取得这样的成绩，这说明中国经济未来仍然具有增长潜力，完全有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就业指标超额完成

如果说人均GDP代表平均每个人创造的财富有多少，是“国富”的指标，那么居民收入的增长与财富积累的程度，就是是否“藏富于民”的象征。

尽管疫情给居民收入带来不利影响，但居民收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上年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快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7540元，增长3.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3.8%，快于城镇2.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6，比上年缩小0.08。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金融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20》指出，全国居民部门财富占比76%，达到512.6万亿元，居民人均财富约为36.6万元。2000年-2019年，中国名义GDP的复合年均增速为12.8%，而社会净财富的复合年均增速为16.2%，高于经济增速。

姚景源认为，居民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居民就业的稳定，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下，过去一年就业优先的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

《公报》显示，去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比上年少增166万人。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均低于预期目标。盛来运说，2020年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扎实有力，就业指标超额完成年初预期目标。

“去年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计划新增900万（就业），实际新增1186万，调查失业率也低于前年，这个成就真是来之不易。”在姚景源看来，经济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而就业是民生之本。

许多经济学者认为，中国每新增一个百分点的GDP，可以支撑200万的就业。如今，仅凭2.3%的GDP增速，如何支撑起1000多万新增就业？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万喆分析认为，去年中国经济的就业指标恢复得好，主要得益于疫情中经济快速恢复，尤其是在下半年，许多企业的出口订单在增加，吸纳了相当多的就业。但她也提醒，随着其他国家加快复工复产，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发力，今年出口型企业要注意外部需求会出现较大变化。

消费正逐步回暖

在这份“综合评价表”中，与消费有关的经济数据最引人关注。

2020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981亿元，比上年下降3.9%。按消费类型统计，商品零售额352453亿元，下降2.3%。受疫情影响，各行各业的消费情况都不乐观，例如，疫情影响最明显的餐饮业收入额下降16.6%。

反映在个人消费支出上，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比上年下降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0%。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9037元，比上年下降8.6%，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2.6%。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支出拉动GDP下降0.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增长2.2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增长0.7个百分点。

万喆认为，目前全社会的消费热情和能力尚未从疫情冲击中完全恢复。首先是因为疫情反复，不同行业受到不同影响，交通旅游航运等消费依然受挫，但食品消费类CPI比较高，甚至出现了通胀和通缩同时存在的情况。其次，疫情影响下，居民储蓄率在升高，消费意愿有所降低。另外，解决了大量就业的小微企业依然面临冲击，资金周转困难、流动性紧张的警报还未解除。

居民消费结构也出现了明显变化。2020年，粮油、食品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9.9%，饮料类增长14.0%，烟酒类增长5.4%，化妆品类增长9.5%，通讯器材类增长12.9%，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下降6.6%，金银珠宝类下降4.7%，石油及制品类下降14.5%，汽车类下降1.8%。

万喆认为，要想促进消费，根本上还是要想方设法提高居民收入，注重营商环境建设，帮助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

她还建议，疫情期间数字文化娱乐服务获得较快增长，已经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可以借鉴日韩等国经验，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放开相关管制。“现在我们的消费趋势，已经从必需品发展到非必需品，从实物产品发展到文化精神产品。”

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春节假期7天，全国电影票房达78.22亿元，比2019年增长32.47%，再次刷新春节档全国电影票房纪录，同时创造了多项世界票房纪录。《2020年中国网络电影行业年度报告》显示，2020年共上新769部网络电影，其中79部影片分账票房破千万元，千万级影片票房同比增长125%。

影视娱乐行业的复苏，也是全民消费能力恢复的缩影。姚景源认为，如今大多数行业的消费情况恢复得都不错，从去年三四季度开始，许多消费指标都已由负转正，并且在逐月回升。今年，在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居民消费将会逐渐回暖。

罕见病用药问题何解

多层保障体系探索搭建共治模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林

2月28日是第十四个国际罕见病日。在中国，这是属于2000万罕见病患者的特殊日子。关注罕见病群体的北京病痛挑战基金会最近发布的《2020罕见病医疗援助工程多方共付实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罕见病群体的用药保障面临许多困难，建议通过“1+N”多方共付模式，搭建多层次保障体系，缓解患者治疗支付压力。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罕见病为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0.65‰-1‰的疾病。目前世界上共有7000多种罕见病，在我国已经发现超过1400种。虽然发病率低，但病种多，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巨大，许多罕见病在我国其实并不“罕见”。全国约有2000万罕见病患者，其中大多数都是遗传性疾病，很多患者在幼年时就会发病，需要终生与病魔斗争。

由于患者群体规模小，罕见病患者经常面临缺医少药的困难。目前，我国已获批上市55种罕见病治疗用药，其中有40多种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因为罕见病用药普遍昂贵，患者群体又太少，在医保控费的背景下，仍有许多罕见病用药没有进入医保。《报告》指出，目前在国内上市的罕见病药品有十余种还未能进入医保，而这些通常都是高价药。以溶酶体贮积症的五类疾病为例，足量用药且全额自付的情况下，年治疗费用都在100万元以上。通过中国罕见病联盟对33种常见罕见病的调查数据来看，除高值药罕见病外，其他罕见病的年治疗自付费用也在数万元，这也给罕见病家庭带来沉重的医疗负担。

从70万元一支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到一年治疗费可达200多万元的艾而赞，天价“救命药”总是引起社会关注。罕见病用药的保障机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针对这类问题，近年来，浙江、湖南、山西、陕西、山东、河北、广东佛山等省市“先行先试”，陆续出台了针对罕见病的用药保障政策。例如，山西、湖南、浙江、四川成都等省市已尝试将部分罕见病药物纳入省级或市级大病保险用药范围，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之外的费用，由大病保险来承担，报销额度从几万元一年到几十万元一年不等。

2015年，浙江省将思而赞等3种罕见病特殊药品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2018年，浙江又将地拉罗司、醋酸兰瑞肽等8种罕见病药物与其他20种药物一起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

《报告》指出，我国从国家到地方的罕见病政策，大致是在保障模式、病种纳入、基金来源、待遇标准四个方面开展了探索，但保障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平衡，保障深度差异明显，对新上市的药品及超高值药缺乏相应的保障等。单一依靠政策保障无法满足罕见病患者的用药需求。

《报告》提出，“1+N”多方共付模式或许是解决上述难题的方案。“1”指的是由政府出资主导，通过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政策保障罕见病患者治疗用药，“N”指的是通过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参与，补充政策不足。通过2020年中国罕见病综合社会调研的结果来看，被调查者（包括罕见病患者、家属、病友组织、医生）也普遍认为，医保应该占罕见病医疗支出的更大部分。

“只有在医保负担大部分的情况下，其他的‘N’才能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报告》指出，现有的罕见病医疗保证政策，除了基本医疗保险外，有罕见病保障政策的省市对保障范围内的罕见病治疗费用能报销70%-80%，最多的可以报销95%左右。不过，在缺少地方政策的地区，依靠非政府的其他保障主体很难真正实现罕见病患者的用药保障。

作为“1+N”多方共付模式的推动者，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于2018年2月，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发起了“罕见病医疗援助工程”。2020年6月，该基金会又联合水滴公益及地方爱心单位，成立了“罕见病医疗援助工程浙江专项、山西专项和山东专项”。

据介绍，项目两年多来累计募集善款超过1000万元，截至2021年2月，共接收求助信息超过5000人次，审核通过已拨款援助病友694人，累计援助善款超过1233.25万元，援助对象覆盖30个省（区、市）的3000多人，涵盖58个病种。

《报告》认为，“1+N”多方共付模式的实现，依赖于罕见病国家政策顶层设计的完善。《报告》呼吁，将罕见病药品尽可能纳入政府保障范围的同时，整合市场、社会等多方资源共同负担，搭建真正的多层次罕见病用药保障体系，缓解患者治疗支付压力，提升药物（尤其是高值药）可及性。

图片新闻

武汉：长江内河最大集装箱船首航

2月28日，停靠在码头的“汉海5号”准备首航驶往上海洋山港。

当日，“汉海5号”集装箱船装载着医疗用品、机械设备、茶叶等产品，从武汉新港阳逻港二期码头首航驶往上海洋山港。据武汉港发集团介绍，“汉海5号”载箱量1124标准箱，是湖北省建造的全国内河装载量最大的江海直达集装箱船。 李海贵/摄（新华社发）

乡村曲箫新曲

2月28日，在焦作市温县招贤乡太涧村，一家古筝厂的工人在制作古筝。

近年来，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招贤乡利用当地良好的桐木资源，开发生产古筝、古琴等民族乐器，作为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来培育。当地以传统手工技法打造、制作的古筝、古琴畅销国内，同时也解决了周边近百名劳动力就业问题，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徐宏星/摄（新华社发）

“年轻人应到新兴制造业中去，那里机会更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年轻人应该到珠三角、长三角去，到实体经济的制造业中去。”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国资管理与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文宗瑜在做客中国青年报·三面财经直播间时向正在找工作的年轻人发出号召。

这位中国智库的学者前段时间做了一次关于“就业难”和“人才荒”的调研，发现形势有些严峻，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型阵痛期，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市场上中低端“就业难”与中高端“人才荒”的矛盾更加凸显。

硬币的一面是年轻人挤破了脑袋想去北上广，想去互联网大厂，导致竞争异常激烈，另一面则是大量制造业企业的招人需求得不到满足。文宗瑜表示，这样的结构性错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促就业’政策的成效和年轻人真正的获得感。

“年轻人就业的观念需要改变。”他说，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广阔的天地未来会大有作为。

文宗瑜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制造业企业希望能有更多高校毕业生加入进来。一些企业主告诉他：在同样招人用工的条件下，大学生比普通农民工更受欢迎；“大学生是排在优先序列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传统企业在积极谋求转型，当中产生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和岗位，尤其是在新兴制造业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未来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建设‘制造强国’更是摆在了首要位置。

珠三角、长三角显然是当下乃至未来5年中国经济、中国制造最有活力的两大区域。在文宗瑜看来，选择去那里就业，选择制造业是在投资未来。

“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有个错觉，认为金融证券、互联网等现代服务业收入更高，但从实际数据及调研情况来看，高收入的岗位很多集中在制造业企业。”文宗瑜表示，根据他和团队追踪的数据，毕业5年后的大学生在制造业企业中很多能提升至中层岗位，在格力、美的等制造业头部企业中，年薪30万元以上的比比皆是。

在制造业中，文宗瑜着重提及了新兴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这两年的发展给了他惊喜。调研中，他发现目前中国新兴制造业企业发展迅速，人才缺口更大。“他们为年轻人提供的报酬更多，而且未来收入增长的空间也更大。”

他说，年轻人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和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做大做强紧密结合在一起，机会就会更多，也更有成就感。

针对当下“就业难”与“人才荒”的结构性矛盾，文宗瑜认为化解要从“促就业”切入。

“如果只是简单实现劳动要素的供给需求平衡，仍然无法解决‘就业难’与‘人才荒’的结构性矛盾。”他说，着眼尊重劳动要素配置的内在规律，通过“促就业”优先缓解‘就业难’压力；随着就业压力的缓解及就业岗位增加，在‘促就业’及增加就业过程中会带动人才培育培养，“‘促就业’的成效越明显、增加的就业岗位越多，培育培养出的人才也会越多。”

他还说，面对当下仍在继续加大的就业压力，政策应相应调整，鼓励更多企业提供短时就业岗位与分时工作岗位，允许企业的短时就业岗位与分时工作岗位免交社保及住房公积金，给予企业灵活用工的更多自主权。当然，政府也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激励企业提供短时就业岗位与分时工作岗位。在某种意义上，企业灵活用工的自主权越大，越愿意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另外，大学生从校门走到工厂是关键一步。建立企业层面有资金、有机构、有专人保障的实习制度可以形成‘促就业’与‘育人才’的共振。

“要把当下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就业问题与中高端人才的培育培养及开发统筹考虑。”文宗瑜提到，发达国家大多建立了完善的大学毕业生实习制度，企业会专门安排预算资金、专类机构、专门人员或管理技术人员定期轮岗对大学生进行指导。

具体来看，大学毕业生的实习可以从大学毕业前一年持续到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以2-3年为实习周期，大学生自愿进入建立了大学毕业生实习制度的企业实习，企业除了根据大学毕业生实习制度规定给予大学毕业实习生生活保障及实习工作补贴，还要安排专门人员或技术管理人员定期轮岗对大学毕业实习生进行实习工作指导，更要对大学毕业实习生的实习工作指导进行效果评价；大学毕业实习生实习工作结束后，既可以选择留在实习企业工作，也可以选择其他企业或机构的就业岗位。

文宗瑜说，通过这样一个大学生实习制度的建立，来改变整个劳动市场供给的结构，能让整个劳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更无缝隙地对接。